

《中国上市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白皮书》显示

超半数上市公司内控评价报告相似度超90%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在企业组织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下,一套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作为上市公司,常常因为内控缺失导致了有财务造假的动因,各类关联交易引发利益输送,造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

来自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院和广东省企业风险管理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白皮书》显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效果亟待提升,2018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主要集中在资金活动、流程管理、财务报告、资产管理、制度管理、组织架构、人力资源、销售业务、采购业务、信息披露等领域。这是迪博受监管部门委托连续第12年发布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白皮书。

据统计,2018年,345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占披露年度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96.29%。其中,内部控制被认定为整体有效和非整体有效的上市公司分别为3341家、114家,占比93.11%、3.18%。

白皮书显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和合规性有待提

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质量有待提升,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有待提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标准亟待完善。

白皮书指出,个别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未随年报一起披露,而是在报告披露截止日4月30日之后才对外公开;部分公司在年报中提示已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但在公开披露渠道并未找到,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不够。并且,部分公司存在信息应披未披情形,如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未披露内部控制评价范围,或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等披露不完整;个别公司甚至存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缺少评价结论段内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缺少注册会计师签字盖章等关键信息。部分公司还存在信息披露不一致情形,主要表现为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不一致,内部控制报告与年报内部控制信息相冲突等问题。特别是,超半数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相似度在90%以上,报告含金量有待提升。

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方面,白皮书提到,超过1/3的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上市公司经营合规性有待加强。资金活动问题高发,20%以上的内部控制缺陷存在于资金管控环

节。约七成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未有效整改,缺陷整改落实亟待加强。战略、经营和资产安全目标实现程度不及期望目标一半,上市公司内控实施效果有待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前一段时间,深圳一些高价楼盘常常需要验资看房,但没想到一些商铺也希望有人去看,还可以获得“红包”。只是,想要获得这个“红包”的门槛并不低。陈经理从事房产中介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最近他接到这么一个任务:蛇口片区一商铺需要看房人若干名,明确“业务精英”需带指定豪宅的业主到访,听完讲解完成算价后,到访业主即可获得500元红包,而“业务精英”也可获得300元奖励。

客户还是要指定的南山、福田、宝安等多个豪宅小区业主,这难度有点大。”说到这里,陈经理觉得有些无奈。即便如此,从开发商的角度而言,销售目标很

明确——有实力的投资客户。不管是开发商为了制造噱头,还是房产中介拼命找客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卖出商铺。那么,以高铺为代表的深圳商业市场情况到底如何?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深圳一手商业成交7.3万平方米,环比上升23.4%,同比上升109.2%。深圳二手商业(含商务公寓)共成交1907套,环比下降25.9%,同比下降38.2%;二手商业成交面积13.8万平,环比下滑16.1%,同比下滑28.1%,成交套数和面积均为2011年以来各半年度的最低值。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上半年二手商业成交波动较大,除去备案稍有延迟外,商业成交基本符合市场走向,4月开始市场预期下滑,投资

观望情绪升温,成交逐步出现下滑。在罗湖区红桂路,记者看到一处沿街的空铺,记者询问发现,空铺的前身是便利店,但由于经营不善而关门,但空铺不到一个月时间又重新出租。这处住宅小区和公司多,又在地铁口的附近,商业氛围还是要浓一些,一般要找沿街的铺位都很难,所以这个铺位很快就被出租了。”当地房产中介告诉记者。

深圳的各大商圈有冷有热,沿街商铺和住宅小区底商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罗湖是老城区,商业氛围较为浓厚,离上述“贴钱”请人看商铺的位置不远,蛇口和南山后海片区一直是深圳豪宅集中的区域,豪宅小区的底商情况如何?记者在深圳湾三湘海尚小区周边调查发现,这条原本以“深圳湾1街”为名打造的商业街,其实是三湘海尚小区的底商商铺。已经有点发黄的广告牌写着“为后海金融总部配套一座商务区”,可见当时市场对这条商业大街的期望。不过,记者在现场发现三湘海尚小区的底商商铺招租情况并不乐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就在离三湘海尚不远的曦湾华府小区,曾有媒体报道,2011年曦湾华府端头转角处一间仅35平方米的商铺曾经以每平方米48万元的单价售出,创下了当时深圳西部的“铺王”纪录。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实际上目前一些商业项目确实存在过剩现象,但住宅小区底商不属于去库存难的项目,所以政府也需要积极关注,适当进行业态改造,这样底商的发展才会有转机。

刘世锦：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上接 A1 版)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在增长目标的形成机制上,应当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速度和质量有可能出现冲突,需要寻找的是其在逻辑上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目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看也是可争取到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从而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高质量发展 有五大增长来源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在步入中速增长平台后,要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需要有新增长动能与之匹配。您认为当前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新增长来源?

刘世锦: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今后较长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除了土地等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相关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这部分需求潜能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中空间最大且易于获取的。

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是另一项重要任务。从全社会角度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空间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在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尤为重要。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且能够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产业分化、重组推动优势企业、优势行业加快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行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相互推动,带动了研发、设计、咨询、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中国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地位。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第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高难度增长时代”来临

证券时报记者:您所提的“五大增长来源”非常全面且细致,正如改革可能带来阵痛,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否会面临一些阻碍?

刘世锦:上述五大增长来源中,前两个是高速增长时期遗留下来的,后三个则拓展了中速平台上潜在增长率的边界。在这样一幅新的潜在增长率画面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增长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际增长率。

概括地说,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与过去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心、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仔细分析,五大增长来源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有不同,但“门槛”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出来并不容易。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释放五种增长来源潜能的难度各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更为紧迫;后三个来源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

证券时报记者:具体来看,五大增长来源面临哪些障碍?

刘世锦:前两个增长来源本应属于高速增长期,之所以拖下来,是因为其中的体制政策难题未能得到解决。就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而言,涉及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市场公平准入和竞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等已经讲了很多年,但难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则涉及农民工进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清单,就不难理解将其中增长潜能释放出来的难度所在。

后三个增长来源大多属于新潜能、新体制,但也受到旧体制的羁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涉及产业分化重组中市场出清、低效资源退出和社会保障体系托底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更加大胆地对外和对内开放。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无论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质,还是体制机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五大配套发展战略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有效发掘以上

增长来源的潜能?在体制机制方面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刘世锦:要使增长潜力能够充分发挥,需要制定配套的发展战略,目前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效率变革战略;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三是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四是前沿性创新战略;五是绿色转型战略。这些战略的提出,是在明确增长来源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的全方位路径规划。

效率变革的目标,是实质性改变现阶段突出的低效率领域的状态。这些领域包括基础产业等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的部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导致增长潜能受到抑制的城乡融合地带,退出机制不完善的低效产业部门等。简单地说,就是要填平既有的“效率洼地”,达到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效率水准。要完善产权保护,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等。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来源是低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出路主要是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点,是通过反贫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改善居住、医疗、教育条件,大幅提高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水准。同样重要的是增加这部分人群横向和纵向流动机会,促进机会均等。

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依然属于“追赶型增长”的内容。在这一阶段,由于增长更大比重依赖于消费,消费的重要性上升;与此同时,消费增长更多地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实现,对消费类别、品质、便利性的要求超过以往,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对供给侧的刺激。在此意义上,产业升级是对消费升级的反应。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激励,产业升级难以推进和成功。产业升级同时依托于供给侧条件的改进,需要更多的中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和优化组合。

前沿性创新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能够跻身前沿性创新行列,进入科技发展的“无人区”,既是一种机遇,也面临着更多挑战。在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把握创新规律、明确优势和短板、准确定位、抓住时机,都至关重要。要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动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

证券时报记者: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方面,具体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刘世锦: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来源是低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阶

层的收入,出路主要是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点,是通过反贫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改善居住、医疗、教育条件,大幅提高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水准。同样重要的是增加这部分人群横向和纵向流动机会,促进机会均等。

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户籍问题的实质是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进城人员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

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巩固脱贫成果,着力构造脱贫不返贫的长效机制。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创造财富的能力,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成稳定的增收渠道。通过改善基本生存发展环境,尤其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条件,重点提高年轻一代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发展机会,实现贫困的代际阻隔。把仍然存在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系统,守住反贫困的底线。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流动。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的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增加社保资金供给,缩减社保资金缺口,同时促进国有资产结构、治理结构的改革。

促进机会公平。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借助这一途径扩大内需。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的做法。在大体相当的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逐步改变低收入阶层所处的“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要保证以上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体制政策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一个关键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但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上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误解,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应该如何认识?

刘世锦:中国在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40年,是停滞徘徊,还是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

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此,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

国内外对此有不同看法和说法。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那么,靠的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行业垄断、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不尊重知识产权甚至偷盗技术,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应该说,答案是很清楚的,正是依靠后者,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间实现了飞跃。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40年,取得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总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当前,我们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则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国际经贸谈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之处做文章,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当然不能戴上这顶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帽子”,也必须能够朝着完善市场经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

针对改革中面对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得更为彻底,更有效。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些东西是转型期过渡性的,有些东西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正在成长的,还有一些东西属于“新瓶装老酒”。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